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Wang Li, an elderly man with glasses, smiling slightly. He is wearing a light-colored shirt.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20世纪
现代汉语语法
八大家

王力选集

季羨林 / 主编

郭錫良 / 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ERSHISHIJI
XIANDAIHANYU
YUFA BADAJIA

季羨林 / 主编

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王力选集

王 力 / 著

郭锡良 / 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力选集/王力著; 郭锡良编.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6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ISBN 7-5602-3011-3

I. 王… II. ①王… ②郭… III. ①王力-文集
②汉语-语法-文集 IV. H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7976 号

出版人: 贾国祥

责任编辑: 侯文富 封面设计: 李冰彬

责任校对: 孙雁 责任印制: 栾喜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130024)

销售热线: 0431—5695744 5688470

传真: 0431—5695734

网址: <http://www.nnup.com>

电子函件: sdcb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4.375 字数: 366 千

印数: 0 001—4 000 册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可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序

季羨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多年来致力于出版语言学论著，卓有建树，为国内外语言学界所同声赞佩。最近又推出《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黎锦熙选集》、《王力选集》、《吕叔湘选集》、《胡裕树、张斌选集》、《朱德熙选集》、《邢福义选集》、《陆俭明选集》（以年龄为序）。所推八家，实慎重考虑、缜密权衡之结果，对“大家”之名，均当之无愧。此举实有对 20 世纪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作阶段性总结之含义。这也是顺乎学术发展潮流、应乎业内学人心声之做法，一定会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欢迎。

为什么说“顺乎潮流”呢？

现在已经真正到了“世纪末”，再过一年，一个新的世纪，甚至新的千纪，就将降临人间。所谓“世纪”这玩意儿，本来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耶稣，何来“世纪”？可一旦被人制造出来，就反过来对人类活动产生了影响。征之 19 世纪的世纪末，昭然若揭；征之 20 世纪的世纪末，全世界在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动，也证明了同一个事实。因此，专就中国学术界而论，包括文、理科在内的众多学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过去 100 年的研究历程作出总结。回顾过去，绝不是为了怀古，而是为了创新。规模最大的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可能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准备推出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此书涵盖面极广，文、理、法、农、工、医，都包括在里面，用的是词条的方式，由各有关方面的专家撰写。估计此书出版以后，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世纪总结类著作中“博”的典型。我们这套《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则另辟蹊径，先划定一个学术领域，结集100年中业内“大家”之经典著述，既对20世纪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成果和达到的高度予以总结和概括，又为后学的进一步研究搭了一架“大师级”的人梯——这是世纪总结类著作中的“专”的典型。

谈到汉语研究，我首先声明：我并非此道专家；有一点知识，也是破碎支离不成体系。但是，我有一个特点——优点？缺点？尚难断定——就是好胡思乱想。俗话说：“一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对于汉语语法学，我连半瓶都不够，所以晃荡得更是特别厉害。晃荡的结果我已经写在3年前《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序中。我这一篇序的主要内容就是讲汉语与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不同的，写汉语语法而照搬西方那一套是行不通的。我最后说到，语言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分析、再分析，认为可以永恒地分析下去；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其特点是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综合的东西往往有些模糊性。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而汉语尤为突出。序的内容大体如此。这当然都是“晃荡”的结果。但我自信，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最近又重读先师陈寅恪先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师在66年前已经对汉语语法表示了明确的看法，深刻而有新见。我抄几段他的原话：

今日印欧语系谓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尚未能成立，此其所

以甚难也。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组，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音韵学，名学或文法哲学等等，而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

序

陈先生在下面又说：

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模仿印欧语系之规律，编为汉文典，以便欧人习读。马眉叔效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天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在本文中，陈先生还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不具引。

我对中国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只了解一个大概的轮廓，详细深入的情况并不了解。这一项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辉煌的成就，这一点是非常显明的。本书列举的八大家，就足以证明这个事实。但是，按照寅恪先生的意见：必须在从事与汉语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扩展汉语语法学的眼界，而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我也注意到，我们中国语言学家的眼光已经大为开阔了。比如徐通锵先生的《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绪论”中已经讲到“‘印欧语的眼光’和汉语的研究”，力求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如果把汉语与同语系诸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语言的比较研究也深入下去，语言学的成绩将更大。

邢福义先生在所著《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把《马氏文通》问世后 100 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大体上分为三期：

- （一）套用期：19 世纪末期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
- （二）引发期：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至 70 年代末期；
- （三）探求期：70 年代末期至现在。

这个分法是有根据的，因而是能站得住的。邢先生说：“（探求期）大约已 20 年。基本倾向是接受国外理论的启示，注重通过对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探索研究的路子，追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下面邢先生又说道：“应该清醒地看到，这门学科距离真正成熟还相当遥远。到目前为止，许多事实尚未得到深刻的揭示，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得到准确的解释。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二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这都是很重要很中肯的意见。看来邢先生的想法是：所有这一切工作都是探求期第二阶段的任务，也就是说，是 21 世纪的任务。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探求？向哪个发现探求？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去探求？在这些方面，邢先生的话，虽很正确，但不具体。我不揣庸陋，想补充两点。第一点是，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到痒处。我这些话是不是显得太迂阔了呢？我自己并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 21 世纪汉语语法学家继续探求的方向就应该如此。是否有理，那就要请真正的专家来指正了。

1999.06.29

王力先生和现代汉语 语法研究

郭锡良

20世纪是中国语言学发展变化最大又最快的时期，现代语言学理论被引进，中国传统语文学得到了初步的科学总结。汉语研究的各个领域成果累累，每个领域的开辟，都有赖于语言学大师的引领；王力先生就是这些语言学大师中成绩卓著的一位，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汉语语言学的多个方面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

王力先生1900年8月10日出生在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初名祥瑛。6岁入私塾，11岁入博白县高小，14岁高小毕业前夕自己改名王力，字了一。毕业后，因家贫辍学，居家自学，教过私塾，当过小学教师。1921年春，他从一个姓李的学生家借得14箱书，埋头苦读，经史子集，无所不窥，从此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1924年秋，他在亲友的资助下，远赴上海求学，先后就读于私立南方大学、国民大学。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在梁启超、赵元任的指导下，完成了毕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业论文《中国古文法》（1983年，出版时间，下同），从此走上了研究语言学的道路。1927年冬又在赵元任的鼓励下，留学法国巴黎，攻读实验语音学，1932年以《博白方音实验录》（法文）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在巴黎，他广泛接触了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直接受教于约·房德里耶斯（J·Vendryes）。当时在西方盛行的青年语法学派、法兰西学派对他的影响最大，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列·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的《语言论》和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泊森（Otto Jespersen）的《语法哲学》也对他影响很深。

1932年他回国，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专任讲师，讲授“普通语言学”和“中国音韵学概要”，并在燕京大学兼课；1935年升教授。30年代王力先生在清华任教期间，主要是研究音韵学，出版了《中国音韵学》（1936年，1963年再版改名《汉语音韵学》），发表了《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年）、《古韵分部异同考》（1937年）等多篇音韵学论文，为改造传统音韵学、建立代音韵学的学科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清华的前期还翻译了不少法国文学作品，后期重新研究汉语语法，发表了重要的学术论文《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年）和《中国文法中的系词》（1937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随校南迁，先后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组成）和广西大学，1938年秋赶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教授“中国文法研究”和“语言学概要”，出版了《中国现代语法》（1943年）、《中国语法理论》（1944年）这两部创立语法新体系的名著和《中国语法纲要》（1946年）。又利用休假（1939年）赴河内远东学院学习、研究越南语一年，回来开设了汉越语课程，后来写成了在研究汉越语方面富有权威性的论文《汉越语研究》（1948年）。写完三部语法著作之后，他开始研究诗律，在联大开了一门“诗法”课。除教学、科研之外，在抗战期间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先后为《星期评论》、《生活导报》等多份报刊开设小品文专栏，写了不少小品文，成为颇有影

响的小品文作家，有《龙虫并雕斋琐语》一书出版（1949年）。

抗战胜利后，他正准备随清华大学北返，中间应邀赴中山大学讲学，被中大校长极力挽留在中大任教，就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在中大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语言学系，既忙教学又抓行政，但仍然利用课余时间将“诗法”讲义加以整理补充，写成了《汉语诗律学》（1958年）。1948年夏，他准备离开中大回清华，又被岭南大学校长聘任为文学院院长兼学校五人顾问委员会委员。这时解放战争发展迅速，国统区时局混乱，他拒绝了出国、去台的诱惑，1949年10月在广州愉快地迎了解放。解放不久，他就当上了广州市的人民代表，1950年又担任了广东省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他又回到中山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这时他尽管社会兼职多，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但仍不放松教学和科研，在方言和语法研究方面发表了不少文章。

为了培养一批汉语史研究生，并加强北京大学语言学教学和科研实力，1954年他被教育部调到北京大学。秋季开学后，在北大招收了中国的首届汉语史研究生，毅然开出了“汉语史”这门新课，实际上是在我国开创了一门新学科。此后王先生都在北京大学任教，直至1986年去世，30多年，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建设汉语史学科方面，为中国历史语言学研究揭开了新篇章。1957年他出版了《汉语史稿》上册，1958年出版了中、下册。1978年起又着手充实修订，分别改写成《汉语语音史》（1985年）、《汉语语法史》（1989年）、《汉语词汇史》（1993年）。在这时期，他还撰写了《中国语言学史》（1981年）、《同源字典》（1982年）、《清代古音学》（1992年）等专著和一批汉语史方面的重要论文，如《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1960年）、《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1963年）、《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1980年）、《古汉语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1965年）、《汉语滋生词的语法分析》（1979年）等。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在北大，他先后担任过汉语教研室主任和中文系副主任，成为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建设的领头人，对汉语专业教学计划的制订和课程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59年他主持了北大汉语教研室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把它定位为培养学生阅读古书能力的工具课，主持编写了一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讲义，影响及于全国；1961年全国组织统编文科教材，《古代汉语》（1962年）就由他主编。这部教材不但教学实用性强，内容的科学性也是高的，因而出版至今将近40年，始终受到海内外师生和其他读者的欢迎，成为长盛不衰的出版物，并获得首届国家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少有的特等奖。

王力先生到北京大学后，校外兼职和社会活动更多，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他是汉字改革的促进派，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汉字的简化、汉语的规范化、普通话的审音和推广都做了不少工作，写了不少文章。他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不同时期总是提出自己的指导性意见，例如：《中国语言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1957年）、《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1962年）、《我对语言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1981年）。他在《遗嘱》中说：“我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的，王力先生为我国的语言学事业是奋斗不止的，就是在那被批斗的“文革”中，他也背着人写成了《诗经韵读》（1980年）和《楚辞韵读》（1980年）；84岁高龄时还应中华书局之约，动手写一部卷帙浩繁的古汉语字典，直到他病重被送往医院的那天仍艰难地坚持写了300多字。两年时间写了60多万字，完成了全书三分之一的写作任务。先生去世后，由在他身边工作的几个学生遵循他的指导思想继续完成了全书的写作，定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2000年），体现了他在词典编纂学方面的主要思想和理论。

二

我们知道，语法研究只是王力先生语言学研究多领域中的一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又只是这一个领域中的一部分。他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主要是在抗日战争任教西南联大时期，然而他这些年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成果对中国语法学的发展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他在《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中说，自己研究中国语法曾经历“妄”、“蔽”、“疑”、“悟”四个时期。“妄”，是他20岁做高小国文教员时，改编周善培的《虚字使用法》教学生，以为会用虚字就能写好文章，结果大失所望。“蔽”，是他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学英语语法喜欢拿《马氏文通》比着读，写论文《中国古文法》，“只知有词不知有句，只知斤斤于词类的区分，只知从英语语法里头找中国语法的根据”，仍陷于比附英语语法之中。“疑”，是他入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劝他不要以语法为题来做毕业论文，不能像《马氏文通》那样做，因而产生了对以前的中国语法学近10年的怀疑。直到他写出《中国文法学初探》集中表述了他的这些疑惑。“悟”，是他发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才“由疑而悟”的，悟出了“语法的规律必须从客观的语言中归纳出来，而且随时随地的观察还不够，必须以一定范围的资料为分析的根据”，因而创作了《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

朱自清先生早在1943年就说过：“十年来我国的语法研究确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第一，该提出的是本书（按，指《中国现代语法》）著者王了一先生（力）。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和《中国文法里的系词》两篇论文（并已由商务印书馆合印成书），根据他看到的中国语的特征提供了许多新的意念，奠定新的语法学基础。”^①方光焘先生也曾指出：“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是中国语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阶段。当时，中国语法学家们批

王力先生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① 《中国现代语法·朱序》。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评模仿西方传统语法的倾向，接受外国的语言学新理论，同时十分关心中国语法特点的发现。”他说：“王力是这个新阶段的代表人物。1936年他的论文《中国语法学初探》发表，标志着这个时期的开始。”^①他们都肯定王力先生是中国语法学史新阶段的主要代表，肯定《中国语法学初探》（下文简称《初探》）的重要意义。这评价无疑是公允的。

我们知道，虽然早在20年代陈承泽、刘复、金兆梓等也发出过反对“承袭外国文法”（陈承泽《国文法草创》用语）的呼声，作出这一些革新文法研究的努力；但是全国清算模仿比附的研究方法、公开打出反对模仿西洋语法旗帜的是王力先生的《初探》。他在论文中提出“比较语言学与中国文法”、“西洋文法与中国文法”、“死文法与活文法”、“古文法与今文法”、“本性准性与变性”、“中国的文法成分”、“词的次序”等几个重大问题分别加以讨论，从理论的高度批评了模仿比附的研究方法，努力探讨了中国文法的特性和研究方法。正如他自己说的：“本篇的旨趣不在乎搜求中国文法里的一切系统，只在乎探讨它的若干特性，希望从此窥见中国文法的方法。”论文还强调指出：“我们对于某一族语的文法的研究，不难在把另一族语相比较以证明其相同之点，而难在就本族语里寻求与世界之语族相异之点。”（着重号原有，下同）并宣称“此后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在乎寻求中国文法的特点”。这就是说，不管西洋哪种语言的语法系统，拉丁语也好，英语也好，都不能拿来比附，而是要根据汉语的实际来寻求它的语法特点，概括出它的语法规律。在论文的末尾，他说：“我此后研究中国文法，当从这一条路出发；待修正的地方虽多，大致的方向是从此决定的了。”应该承认，这篇论文不仅是王力先生决心革新文法研究的“宣言”，也是吹响了30—40年代“中国文法革新”大讨论的号角，正如上文所

^①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造句法〉导读》，《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7页。

引方光焘先生指出的，它是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标志。

三

《中国现代语法》(下文称《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下文称《理论》)更是王力先生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代表作，也是他实践自己革新文法研究“宣言”的重大成果。这两部书正式出版虽然都在1943年以后，它写作和流布的时间却早得多。在《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中他曾叙述这个过程：“二十六年夏，中日战事起，轻装南下……在长沙买得一部《红楼梦》，寝馈其中……于是开始写一部《中国现代语法》，凡三易稿。二十七年秋，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担任‘中国文法研究’，始将此稿印为讲义。”后来“又相信闻一多先生的话，把它分为两部书，一部专谈规律，一部专谈理论，相辅而行。直至二十八年冬，才各完成上册，又至三十一年夏，才各完成下册”。吕叔湘先生也说过：“抗日战争初期，王先生在西南联大教课，讲授‘中国现代语法’。那时我也在昆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教英语。1939年暑假后，系里给我加了一门‘中国文法’，那时候王先生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我借来一份参考。”^①这说明王先生是1937年开始写《中国现代语法》的，1938年秋用来讲课，讲完课，1939年春就作为讲义印了出来，在学术界已经深有影响。因此他不仅是吹响文法革新号角的号手，同时也是实践文法革新取得突出成果的第一人。

《语法》和《理论》是孪生的姊妹篇，两部书的章节完全相同。《语法》偏重描写汉语的语法现象，说明汉语的语法规律；《理论》则偏重比较中外语言的异同，探讨汉语语法的特点，并从理论上加以说明。这两部书所建立的语法体系比之旧的语法体系，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力先生从汉语的本质特点出发，指出：“汉语没有屈折作用，于是形态的部分也可取消。”因

王力先生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① 《悼念王力教授》，载《人民日报》1986年5月16日。

此这两部书的语法体系布局独特，一反西方语法大讲词类的方式，基本上都是讲造句法，把词类归属于造句法，只占造句法中的一小节。标明《造句法》的就有一、二两章，其他四章也是或者讲帮助造句的成分，或者讲造句法的特殊形式或造句法的发展变化（《欧化的语法》）。这是一种地道的句本位语法，但是同黎锦熙先生的用“中心词分析法”分析、图解句子的六大成分的句本位语法却是完全不同的。它几乎不单独分析句子的成分，而是探寻有汉语自己特色的句类、句型，发掘汉语组词造句的特点。

在发掘汉语语法特点方面，王力先生富有敏感，分析细致深入，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创见：

（一）它摆脱西洋传统语法把句子分成名句和动句两类的做法，而是根据汉语的特点，把句子分成判断句、描写句和叙述句三类。他说：“在现代，判断句须用系词做主语和谓语的媒介，借此与描写句分别。在上古，判断句也像描写句一般地不用系词，但判断句可用‘也’字（孔子，鲁人也），而普通描写句不能。由此看来，自古至今，描写句和判断句在结构上总是有分别的，所以不该混为一谈。”

（二）最先提出“句子形式”和“谓语形式”的概念。他说：“凡两个以上的实词相连接，能陈说一件事情者，叫连系式。”“一个连系式可以是一个句子”，“但它又可以是句子的一部分”，“咱们可以给它一个总名称，叫做句子形式。”又说：“谓语形式专指复杂的谓语而言。”“一个谓语形式可以是一个谓语，如‘我在家里’”，“又可以是谓语的一部分，如‘我在家里念书’”。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对分析汉语的复杂句子结构是有意义的。

（三）在仔细分析汉语单句内部的各种结构关系和意义表达中，揭示出汉语中那些不同于西方语法的特殊的句子结构，即叙述句中谓语包含一个以上动词的各种句型。这是王力先生的语法体系中最富创造性的部分。按照印欧语的造句规则，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定式动词，也只能有一个定式动词，如果有其他动词，就只能采取不

定式或分词的形式。但是汉语没有形态变化，造句规则与印欧语也大不一样，一个句子既可以没有动词，也可以有一个以上的动词。前人模仿西洋语法，仿造了一个“散动词”的名目，来对付句子中的一个以上的其他动词。王力先生完全撇开传统的说法，从汉语的特点出发，采取新的角度来分析汉语的句式格式，根据谓语形式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关系，划分出“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紧缩式”等多种汉语特有的句式。这些句式大多被后来的语法论著所沿用或吸收，影响是深远的。

(四) 把系词、数词分别从动词、形容词中划出来，单独设类。这也是王力先生的首创。他指出：系词是“连接主位和表位的一种词”，“并非句子的要素：非但叙述句用不着它，若就中国语而论，连描写句也用不着它，只有现代的判断句，才用得着它”。“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凡普遍认为修饰系词的末品，除了否定词外，都该认为修饰整个谓语的”，因而应该“把系词认为虚词”。正如朱自清先生指出的：“这成分关系句子的基本结构，关系中国语的基本结构，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系词的问题解决不了，本书便能提供一种新的句子的分类。”^① 数词从马建忠到黎锦熙先生，都仿照西方语法把它归入形容词之中，王力先生却把它独立出来，理由是：“因为形容词能单独用为谓词，而数目字不能；数目字能带单位名称，而形容词不能。”两者的语法功能不同，自以分开为妥。

(五) 《新著国语文法》仿照纳氏文法把包孕句归在复句中，王力先生却把它从复句中剔除出去，归入单句。他指出：“中国的句子形式，处于被包含的地位时，究竟和西文的 clause 不尽相同。”西文的 clause 必须有一个定式动词，可以根据定式动词的数目去断定句中的 clause 的数目；汉语却没有定式动词、非定式动词的区分，于是很难断定某一个语言形式是不是一个 clause 了。“尤其是次品句子形式，它在中国语里只等于一个单词的用途”，不像西文

^① 《中国现代语法·朱序》。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要有关系代词或关系副词连接。因此包含着句子形式的包孕句只是单句。显然王力先生的意见是对的。这对分清单句、复句的界限是有利的。他还提出：“中国的复合句往往是一种意合法。”这个提法也是符合汉语特点的，后来被语法学界不少人接受。

在探索研究语法的理论、方法方面，王力先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结合汉语的特点，较好地应用了房德里耶斯、布龙菲尔德、叶斯柏森等人的学说，有取舍，有变化；尤其是《理论》比较了中外语法的异同，从理论上对新体系加以阐明，带有比较语法学的性质，为建立中国的语法理论、推动中国语法的研究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分析句法结构时，更是王力先生第一个在汉语中运用“插入法”和“转换法”的。

(一) 在分析字、词、词组的区别时，他提出了运用插入法。他说：“若要辨认两个以上的相连接的字是否一个单词，有一个最简单的法子，就是试用另一个字把它们隔开，看它是否失掉原来的意义。”又说：“复音词是不能被隔开的，伪语则可以被隔开：例如‘老婆’是复音词，因为咱们不能说‘老的婆’而意义不变；‘老人’是伪语，不是复音词，因为咱们还可以说成‘老的人’，而意义不变。”这个“插入法”用在汉语语法结构的分析中是很有用的，后来陆志伟先生在《汉语构词法》中也用它，并发展成了扩展法。

(二) 在讨论词组、句子形式和特殊句式时，王力先生在多个问题的分析中运用“转换法”。他说：“依原则说，一切连系都可以转为组合，如‘鸟飞’可转为‘飞鸟’，‘国大’可转为‘大国’；一切组合也都可以转为连系……”又说：“如果咱们细揣中国人说话的心理，并追溯中国语的历史，就会得到另一种结论的。依现代中国人的语象，‘我叫他马上就来’是‘我叫他’和‘他马上就来’的结合。”还说：“中国语的结构好像无缝天衣，只是一块一块的硬凑，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复合句的紧缩“也就是把相关的两件事硬凑在一起”，它“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复合句的两个构成部分之间没有语音的停顿”。例如“兄弟来请安”，按王力先生的说